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

◀ 丛书主编/吴康宁

在生活化的旗帜下

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

ZAI SHENGHUOHUA DE QIZHIXIA

齐学红/著

在国家、市场、社会

与个体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表达得以可能的开放时代，

“生活化”作为道德教育改革的旗帜或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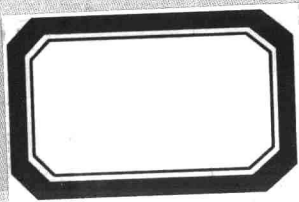
更加凸现了借口的社会学意涵；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微观政治，

具体体现了学校生活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吴康宁

ZAI SHENGHUOHUA DE QIZHIXIA

在生活化的旗帜下

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

XUEXIAO DAODE JIAOYU GAIGE DE
SHEHUIXUE YANJIU

齐学红/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生活化的旗帜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 / 齐学红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 / 吴康宁主编)
ISBN 978-7-5495-1086-3

I. 在… II. 齐… III. 学校教育：德育—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G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282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14.25 字数：186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前言 道德教育改革的背景呈现 / 1

- 一、问题意识 / 2
- 二、学术资源 / 9
- 三、研究方法 / 15
- 四、内容框架 / 19

第一章 道德教育改革的历史演进：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 21

第一节 去政治化：道德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纠结 / 22

- 一、泛政治化道德教育及其表现形态 / 22
- 二、道德教育、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 / 25

第二节 从政治化到生活化：社会控制的系谱 / 27

- 一、从泛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生活与政治的关系嬗变 / 28
- 二、国家政治的制度框架：从《中小学德育大纲》到《课程标准》的变迁 / 30
- 三、从知识价值到生活意义：教科书的文本分析 / 34

第三节 榜样教育：政治对生活的僭越 / 39

- 一、榜样教育：作为一种治理模式 / 39
- 二、榜样教育：政治对生活的僭越 / 41
- 三、透视“感动中国”现象 / 43
- 四、去政治化的教育何以可能 / 47

第二章 道德教育改革的历史演进：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 49

第一节 回归生活道德教育理论的诞生 / 49

- 一、酝酿过程：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的台前幕后 / 51
- 二、学科命名：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博弈 / 52

三、理想设计：学术自觉与实践关怀 / 54

第二节 从普遍主义到个体价值 / 58

一、理想类型：从规范道德到伦理道德 / 58

二、回归生活：价值预设与生活事实 / 59

第三章 在生活化的旗帜下：道德教育改革的话语政治 / 64

第一节 生活化的话语逻辑 / 65

一、生活化的自我论证 / 66

二、作为旗帜的生活化 / 68

三、作为理想型的改革共识 / 71

第二节 生活化的实践场域 / 74

一、制度环境：资本运作 / 76

二、实践样态：各自为政 / 78

三、课程实践：专家引领 / 79

四、知识系谱：差序格局 / 83

第四章 地方性知识：道德教育改革的学校经验 / 88

第一节 理论先行：解放教育力的体制改革 / 90

一、改革的发生：教育实践初现端倪 / 90

二、理论的作用：从自发到自觉 / 91

第二节 制度创新：新型教育关系的建立 / 96

一、制度建设：整合教育内部关系 / 96

二、制度导向：改变教师工作方式 / 97

三、制度价值：营造教师合作文化 / 98

第三节 意外后果：惯习的力量 / 100

一、教育民主：从观念到行动 / 100

二、人人有责：教师的角色转变 / 104

第四节 改革启示录：一项教育改革的诞生 / 105

一、社会责任：教育改革的动力来源 / 105

二、自上而下：改革路径的实践探索 / 108

三、实事求是:实践进程的自我修正 / 110

四、践行民主:生活与教育的关系诠释 / 113

第五章 从压迫到解放:道德教育改革的动力 / 116

第一节 道德课堂:由教向学的转变 / 117

一、引领生活:后生活化时代的品德课堂实践 / 117

二、对话生成:道德学习的课堂建构策略 / 120

三、意义建构:道德课堂的价值取向 / 125

第二节 教室革命:转化型知识分子及其可能 / 126

一、角色担当:转化型知识分子 / 126

二、敏于观察:发现教学魅力 / 129

三、鼓励质疑:打破文本权威 / 131

四、对话文本:发掘地方性知识 / 133

五、制度批判:质疑体制化生存 / 135

第三节 解放学生:主体地位与权利表达 / 142

一、以学生的名义:作为借口的教育改革 / 142

二、隐匿与彰显:学生权利及其表达 / 143

三、主体的缺位:改革进程中的学生 / 149

四、学校印刻:惯习的力量 / 153

第六章 实践逻辑:后生活化时代的学校德育 / 158

第一节 学校德育:能指与所指 / 158

一、既有观念:教师的道德认知 / 160

二、跨越边界:后生活化时代的德育困境 / 163

第二节 德育实践:维稳与求变 / 167

一、路径依赖:学校德育的策略选择 / 167

二、维稳:学校德育的底线生存 / 169

三、求变:对于社会资源的谋取 / 170

四、考试化生存:学校德育的“名与实” / 172

第三节 德育教师:顺应与抗拒 / 174

- 一、学科地位与生存境遇 / 175
- 二、被期待的教师角色:人生导师 / 178
- 三、专业自主与利益诉求 / 182

第七章 道德教育改革中的社会力量 / 185

第一节 利益表达:社会力量的动员 / 186

- 一、知识与权力:专家的作用 / 186
- 二、权利与利益:作为单位的学校 / 188
- 三、搭便车现象: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 / 191
- 四、台前与幕后:不可或缺的行政力量 / 192
- 五、偶然与必然:改革进程中的个人因素 / 194

第二节 时空与资本运作 / 195

- 一、时间与空间:场域的作用 / 197
- 二、道德教育与文化资本的遭遇 / 199
- 三、道德教育改革的实践感 / 203

结语 道德教育改革的人性维度 / 206

- 一、改革呼唤道德之师 / 207
- 二、教育即对生活的改造 / 209
- 三、道德教育改革的人性维度 / 212



道德教育改革的背景呈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期。这一转型给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改革的持续进行。教育改革作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核心话题,不但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教育投入几乎成为每个家庭的第一投资热点),同时也频繁出现于媒体报道和各类公共话语空间之中。教育自身问题积弊之深,受社会关注程度之高,使得教育改革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领域都首先成为一种话语政治。“要不要改”的问题,亦即对改革的态度问题成了第一位的问题。体现在“说与做”的关系上,便是言说重于行动,进而演化为一种话语实践;至于“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样改”之类的实质性问题反倒退居其次。

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语境下,改革极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认为凡是改革总是好的,改革成为积极、进步、发展的代名词,反对改革或不赞成改革,则代表着逆社会潮流而动,是负面消极的代名词。于是,在改革的洪流之下,往往存在着鱼龙混杂的局面,真改革与伪改革、进步与保守,各种力量纷纷登台亮相,竞相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个人私利往往会以集体的名义、改革的名义出现。进而导致人们对改革持盲目乐观态度,对改革前提性假设的不容置疑,即现实中的教育总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必须通过改革来完成对旧的教育体系的改造;改总比不改好,新的总比旧的好。其结果是,对于凡是冠以改革之名的教育行为,人们往往很少会对其先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必要的质疑与批判。随着教育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人们对改革的热情逐渐消退,对改革的热情、盲目乐观、一味追捧逐渐代之以理性的审视与思考。教育改革究竟取得多大成就?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教育改革如何推进?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加以理性反思,并作出学理上的解释。将教育改革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社

会事件,将其缘起、内容、推进过程以及参与其中的利益群体及其运作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域,引入研究的视阈,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一般来说,对于改革的系统反思总是在改革的实践之后,道德教育改革也不例外。

道德教育改革可以说是教育改革中更具内核性的部分,教育改革与权力政治、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这无形中给教育改革的反思与批判增添了难度。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研究基本上是哲学人文取向的研究及实践层面的研究(即具体教育、教学过程以及课程内容等的研究等)。而无论是哲学层面的探讨还是实践领域的推进,成果本身都构成了关于道德教育改革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之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试图把道德教育改革放在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之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道德教育改革的实践推进过程审视,从制度设计到具体实施中遭遇的一系列实践逻辑,揭示改革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真实地再现道德教育的思想轨迹和实践样态。

本研究只是研究者对于道德教育改革的一种个人解读,改革是一种开放的文本,我们每个人所能看到、感受到的,都不过是冰山一角,难以穷尽其每个细部。对于教育场域中的每个个体而言,无不身处此项变革中,在涉及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以及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之类的根本问题上,每个人都是当事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对研究者而言,由于受到个人所处地位、阶级阶层利益、知识储备及学术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局限,所谓完全置身事外、绝对客观公正云云,都只能是一种对外的宣称和自欺欺人的谎言。只有公开自己的研究立场或者阶级偏见,把研究者自身也作为审视对象,作为构成整个研究场域的一部分,尽可能予以客观处理或呈现,这才不失为一种客观的态度。

一、问题意识

(一) 对道德教育改革总体性特征的理论概括

可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行为大致具备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从改革的发生来看,改革是一项由实践主体主动发起的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其二,从改革的进程来看,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不是一蹴

而就,或推倒重来,而是一项渐进式的变革;其三,作为改革的结果,势必会对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和影响,即改革最终会指向对人的生活的改造。

构成一种社会事实的道德教育改革,不仅包括预设中的教科书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教学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还包括实践中正在发生的预设之外的突发事件及其变化,改革必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动态发展过程的辩证统一。改革的理想本身在接受实践检验的同时也在不断自我调整与发展完善。因此,不同领域的教育改革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理解为是围绕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而展开的斗争。

就道德教育改革而言,其中不乏改革精英为了教育理想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否则社会就不会发展进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尽管这句话在中国的语境下极易被人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借口,但是,仍会有少数人将此奉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奋斗,他们是一群超越了个人私利和低级趣味的特殊人群,即鲁迅笔下的“中国的脊梁”。改革者的社会担当或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生活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变革时期,都呼唤并产生了这样一群人。“人民”在他们心中不是空洞无物的托词或借口,而是具体化为“为了学生的利益”而采取的某一项具体的改革行动,如为了将学校刺耳的上下课铃声改为舒缓的音乐声,一位教授级语文特级教师将上下课铃声时间做了一个统计,将其危害及改革的必要性写成一份书面报告呈送校长办公室,反复上书未果,最后感动了学生,由学生直接反映给校长,最终解决了问题。有人认为坚持做这样一件小事与一位教授级特级教师的身份不符,但是,在这位教师看来,他所做的就是一位教师的本分。一位有着快乐童年生活经历的小学教师,对于当今小学生的学习压力与生存状态倍感痛心,致力于给孩子创设更多的机会,增进他们的生活体验和课外活动;一位中学校长有感于当前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顶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每周停课一天,在全校每个班级开设劳动课,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积极参与学校生活。他认为,劳动意识、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是在中学阶段完成的,到了大学再培养就迟了。这样一些心怀教育理想的有志有识之士,他们的教育行为正在改变着中国基础教育的现实。道德教育改革不能采取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方式,也未必一律采取自上而下式的整体改革,而是以其日常化、生活化以及当下性,对学生的行为方式

及其内在品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道德教育的魅力往往表现为一种无声的力量。在此意义上,道德教育改革的力量在民间,在普通大众身上。

如果说其他领域的教育改革更多涉及教育与社会外部系统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与再分配,那么,道德教育改革则更多地来自教育自身,是对“什么是理想的教育”,以及“教育应该培养怎样的人”的不同理解,即意义和价值之间的纷争。而一旦涉及意义和价值问题,势必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观点。既有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考量,也有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培养自己所需“接班人”的不同期待,也有为了争取更多教育资源而展开的斗争,如尽可能动员各种社会资本为自己的子女择校、择班,争取三好生、保送生名额等。

(二) 对道德教育改革实践进程的把握

道德教育改革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中小学品德课课程标准的制定、实施为关键事件,由此带来的品德课教科书改革、课堂教学改革,以及教师、学生课堂行为等的一系列变化;改革遵循的内在逻辑体现为道德教育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什么生活最有意义”(过有道德的生活),从知识取向到生活取向的现代转型与蜕变。这个过程的艰难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超出了改革设计者的预设,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偶然因素和未知变量,则使得改革进程呈现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广阔画面。具体而言,道德教育改革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问题,在国家、社会、个人多元价值诉求和现实表达得以可能的开放语境下,以道德教育生活化作为改革的“共识”,进而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本研究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围绕《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的出台这一关键性事件,揭示生活化作为各方利益表达的借口,以及改革“共识”的达成过程,具体呈现在看似整齐划一、极具普适性的道德教育改革行动背后,政府、专家、学校、教师和学生等主要利益群体之间,在特定场域下展开的价值纷争、多元诉求及其实现过程。进而揭示出,在道德主体多元化与社会控制精细化的双向促动下,道德教育呈现出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控制,向着生活本意回归的改革进程。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维度构建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解释性框架。

道德教育改革与政治教育改革遵循的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政治教育是由情入理,情感因素越来越少,更多地依靠说理,以理服人(国家政治的合理化论证),而不是凭借朴素的阶级感情(作为政治教育的情感资源,即阶级情感消

逝了)。道德教育则越来越从道德说教(理性化、学科化的追求,注重道德知识的灌输),走向关注人的完整精神世界,情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媒介,教育形式从注重灌输到借助一系列情感化手段,例如,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教育,在逐渐摆脱国家政治的宏观控制后,日益回归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微观政治,进而成为一项民心工程、人心工程,日益走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这在回归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中之得以集中体现。

道德教育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德育学科和政治教师,而更是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教育即生活,要想影响学生的品德养成,就要从改变学生的生活做起。生活作为一个总体性存在,既包括学生的学校生活,也包括其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道德教育改革的目标即通过教育改造学生的生活,首先是从课堂生活、班级生活、学校生活做起,进而改造人们的社会生活。例如,作为未来社会公民的良好素质,中小学生普遍增强并形成的安全意识、环保意识等,无疑会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影响、改变学生,进而影响和改变民族的未来。因此,道德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不仅局限于德育课堂,而且体现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 道德教育改革的思想轨迹

如果说教师教育改革的实质是培养权之争^①,即国家需要的教育人才由谁来培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围绕培养权展开的高等院校之间以及高校内部的权力与利益之争,那么,道德教育改革则是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更多涉及教育内部对于人才标准问题、如何培养的问题(即方式方法问题)展开的,主要表现为意义之争、价值之争。尽管更多涉及的是教育内部的关系问题,如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智育、体育、美育等的关系,却也并非教育自身的问题,同样涉及教育与社会外部因素的关系,如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道德教育的发展先后受到来自上述几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首先是政治对于教育的影响,直接表现在人才培养标准问题上。在新中国教育历史上曾一度把政治标准作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国家评判教育成败的关键问题;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人才标准

^① 杨跃. 教师教育的诞生——教师培养权变迁的社会学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中技术含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人的素质,主要是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首次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在理论上仍然强调“德育为先”、“德育首位”,但是,政治标准实际地位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在人才培养方式方法上,从政治说教为主,强调整齐划一,到开始关注并尊重人的个体差异性,人才标准趋向多元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手段的日益普及化,在对道德教育手段、途径与方法带来直接影响的同时,在教育内容上开始注重培养学生在信息化时代的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①

从道德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维度分析,我国道德教育改革大致经历了一个“泛政治化—去政治化—生活化”的发展轨迹,即从努力摆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控制,到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即回到教育本身,体现为对教育自身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一位老教师将自己全部的教育经历概括为一句话,即教育不违背常识。“教育工作,不过是依据常识并教会学生遵守常识,学会学习并养成好习惯。至于我们在教育中的发现和创造,最终也必然成为常识的一部分。”^②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却屡遭践踏。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提出教育要商品化、产业化,学校教育所做的都是非教育甚至反教育的行为。回归生活道德教育理论命题的提出,正是在吸取上述历史教训基础上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使教育回归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办事的正确轨道上来。但是,也应看到,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仅仅指明了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不可能穷尽一切现实问题。后生活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实践仍然面临“在夹缝中生存”的困境。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有了新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考试化生存的教育现实。作为单位的学校并非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学生学习知识的场所或道德的净土,而是处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链或利益链之中。

从课程标准的出台,到新教材的编写,课堂教学的改革,后生活化时代的道德教育改革在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控制、走出神圣的政治帷幕的同时,开始直面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和现实困扰,并作为一种微观政治,以其日常性、神圣性、趣味性,实现着对师生日常生活及其行为的塑造。而这种日常化的改

① 吴康宁.教会选择:21世纪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由之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3):10-18.

② 吴非.致青年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

革并非刻意表现在课堂教学改革中,而是具体化为教育场域中每个人当下的行为与交互作用中。在此意义上,道德教育改革始终存在于教育实践活动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起始界限。对于道德教育改革者而言,他们的抗争并非围绕着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之争,而是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公共性及超越性,他们的改革实践或精神状态则可以概括为一群理想主义者为理想而战,作为他们努力反抗或抗争的对象则是现存的不合理的教育体制或制度。同时,他们的反叛行为还表现为对学生命运和生存境遇的普遍关注,对学生身上表现出的革命性力量的尊重、支持与肯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进程。

本书中所关注的学生权利及其表达具体体现为:教师有意识地吸纳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将班级的后黑板变成学生行使民主权利的舞台;学校建立学生代表大会制,学生值周制,考试成绩复议制,等等。而这些做法的落实与实现反映了社会民主化进程背景下学校领导以及普通教师民主意识的觉醒,以及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只有教师的自我变革才能带来学生的解放。正如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这群批判教育者成为社会运动及行动中的“书记员”,他们正投身于挑战现存不平等关系的行动中,该行动有时被称为“非改革主义的改革”。^①同时也意味着,批判教育者要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正如布迪厄给予我们的启示,知识分子付出智慧性努力固然必要,但是他们“不能对事关我们世界未来的斗争和努力,采取旁观者、中立和事不关己的态度”。^②改革实践呼唤教育改革的身体力行者和引领者,在改革者身上往往具有这样一些潜质,他们对教育问题或者人的问题总能保持特有的敏感,他们怀揣理想并善于身体力行,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气质,不容易受他人的左右或支配,并勇于挑战自我,挑战制度强加于人的各种角色限制。他们是一群具有人文气质的知识分子。对于道德教育改革而言,自上而下式的总体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群人的日常教育实践。而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变革,对于整个教育体制而言往往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教育的不断深入,引发了人们对于学校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功能与作用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即学校除了

① 迈克尔·阿普尔,韦恩·欧.批判教育学中的政治、理论与现实(上)[J].比较教育研究,2007,(9):2.

② 迈克尔·阿普尔,韦恩·欧.批判教育学中的政治、理论与现实(上)[J].比较教育研究,2007,(9):2.

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外,在实现对未来社会理想建构中的可能作为,即教育可以为学生创造一种更为理想和美好的生活。

同时也应看到,仅仅怀揣教育改革理想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教育改革的实践进程必须建立在对于教育现实的理性认识与分析判断基础之上。在社会转型期,道德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生存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危机

道德危机构成现代社会人类最严重的灾难和生存困境。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的“现代性”引发的道德危机表现为:实用理性至上,让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人类和人类社会事务都暴露于市,使其接受竞争和交易规则的检验!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环境下,现代世俗伦理不断降低自身的价值目标和道德标准,正当合理性的规范化诉求逐步掩盖甚至替代了人类对卓越与崇高的美德追求。缺乏终极价值关怀成了现代人普遍的道德缺失,因而成了现代社会最稀有的道德精神资源。^①在此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能否担当起价值重建的社会责任?

2. 现实困境:道德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羁绊

道德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特殊性,客观上决定了道德教育研究更多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很难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学术问题、知识论问题更多地被政治性问题所掩盖和遮蔽。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道德教育更多地被视为学校德育工作,而学校德育工作更多地被纳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宏观掌控及学校管理的行政化运作系统中,很难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尽管道德教育已被纳入学校的学科知识系统,进而取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其与国家意识形态仍处于藕断丝连的关系中,很难真正做到独善其身。而德育理论研究自身专业性的匮乏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德育课程内容的频繁变动可见一斑。陈桂生在《我国基础教育中“思想道德课程”问题》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后“思想道德课程”的演进遵循着这样的轨迹:从“思想”较为贫乏,甚至鼓励盲目性的课程转向思想内涵较为丰富的课程;从“道德”缺位的课程转向关注道德学习的课程;从无视对象的“教育”转为试图走近学生的课程。他认为“思想道德课程”频繁变动现象的背后是本土的专业理论的匮乏,而问题的解决是“历史形成问题

^① 万俊人.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见万俊人主编.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四卷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2-103.

只能是历史地加以解决”^①。因此,道德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变革只能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认识与改进。

3. 知识困境:道德科学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关于道德的学问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或知识仍然是一个疑问。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成为 20 世纪中前期西方伦理学争论不休的中心课题,“元伦理学”进而成为 20 世纪西方伦理学的主流之一。“元伦理学”的凸显无疑是现代科学主义压迫的文化后果之一,然而道德的人文本性决定了道德知识的“非科学”命运。一种学院式或学究式的道德知识永远只能是灰色的理论,无法真正反映丰富多彩的人类道德生活世界。^②

总之,道德科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道德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特殊性,共同构成道德教育改革的内外部力量。

二、学术资源

国内学术界对于道德教育改革的认识,一个普遍认同的时间点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即改革开放 30 年来社会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作为既定的社会事实,直接影响道德教育改革的进程。而学校道德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与方式的学校道德教育,往往滞后于总体意义上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即学校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往往成为社会变革中最保守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本身是很值得关注的。

改革开放 30 年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节点,往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道德教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回顾反思类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对本研究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文献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 对于社会转型以及教育转型的相关研究

1. 对中国教育改革性质的认识

中国的教育改革作为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教育改革的目标与社会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具体目标是相互协调的。服从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教育合

① 陈桂生.我国基础教育中“思想道德课程”问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4).

② 万俊人.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见万俊人主编.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四卷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0.

法性的基础之一。^①为此,对于教育改革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总体变革和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之下,否则,教育改革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在对教育转型与社会转型、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的认识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教育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教育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被动回应,即教育是“被转型”了。

2. 对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

与社会转型的研究相比,教育界对于教育改革的背景认识往往不是全景式的,而是选择性的。研究者在描述教育改革面临的社会背景时,往往聚焦在那些所谓的“重要”社会发展趋势、任务或要求,并着力分析其对整个教育工作和青少年发展提出的挑战及应对策略。至于哪些因素会被研究者作为背景参照或提出改革目标的依据,则取决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如某种发展趋势的社会共识程度、某些社会任务的紧迫性程度、实现某些发展要求的政治意愿以及它们与教育实践的关联程度等。教育改革30年的背景认知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教育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提出的客观要求。受制于这样的背景认知,教育改革明显具有一种外部驱动的特征。^②总之,教育改革的发生往往体现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而对于教育的认识本身,则体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3. 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教育改革基本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主要表现为:每一时期教育改革的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具体负责落实中央的改革设想,并为改革创造和提供必要条件。每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到保障机制都遵循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从学校到教师逐级落实、分层推进的自上而下式路线。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往往借助于行政和舆论的双重力量进行动员和推进。行政的力量表现为对改革政策执行不力者进行行政问责;舆论的力量表现为通过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进行宣传 and 呼吁,介绍并推广正面的典型经验等。

① 石中英,张夏青.30年教育的中国经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5).

② 石中英,张夏青.30年教育的中国经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5).